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形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

●贺玉龙

强大国内市场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当前我国内需扩张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亟须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和动力升级,不断形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其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对经济产生显著增量贡献与质变引领的新兴领域,培育和壮大那些代表技术前沿、契合结构变迁的新需求与新供给,以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为载体,实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良性互促,这也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供需两侧的生动物体现。

人民至上引领的内需新动能

坚持人民至上,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建议》强调,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内需扩容升级,本质上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有形投射与具象化满足。人民对更优质教育、更可靠医疗、更舒适居住、更丰富文化生活的向往,是内需扩张的根本源泉。扩大内需必须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同向而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将为内需增长筑就坚实微观基础。

扩大内需是发展目标的人民性、发展过程的包容性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的集中体现。一切新增长点的孕育与勃兴,都必须立足于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十五五”时期培育内需新动能有两大基本路径:一是以需求结构的动态升级为导向,推动供给体系从“满足基本”到“引领优质”的跨越;二是以人的发展为根本,通过优化空间布局与制度环境,释放被抑制的消费潜能与投资空间。不断形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要求精准锚定人民在生命健康、精神富足、环境宜居、社会公平、安全保障等方面的价值诉求,重构消费与投资

的逻辑,走出一条内需价值与人的价值同步提升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创新赋能驱动的新消费生态

在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双轮驱动下,消费生态正经历系统性重构,呈现出场域延展、空间突破、边界消融的新特征,催生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新消费增长点。第一,居民消费正从“有”向“优”转变,表现出个性化、精神富足与便捷普惠的消费新追求。以人工智能、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智能技术通过数字赋能,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创造前所未有的消费体验。第二,在时间价值最大化与体验追求极致化的消费趋势下,低空与深空经济的创新应用能够重塑消费的空间边界,将内需的边界从平面地理推向立体空间。第三,消费者愈发追求精神层面的深度共鸣,社群认同与在地文化走向,推动“文娱+体育+旅游”从简单叠加走向有机融合,孕育出丰富多元的服务消费新形态。例如,电子竞技以其独特的互动性和文化黏性,衍生出从赛事版权、直播打赏到线下观演、主题旅游的千亿元级服务消费生态;“村BA”“村超”等民间赛事将地方文化、乡土情感与全民运动热潮深度融合,提供了一种集赛事观赏、民俗参与、特产消费于一体的高情感附加值创新服务产品,引爆了新的消费热潮。

马克思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同一体,即“生产生产着消费”,同时“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创新赋能新消费生态和场景,正是这一辩证关系在新时代的生动演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所催生的新需求,构成供给创新的根本动力,后者又创造出新的消费对象、新的消费方式和新的消费动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人工智能对传统内容生产的颠覆、低空经济对时空约束的突破、文体旅融合对产业边界的重塑等,均构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

绿色转型催生的新投资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双碳”目标下,人民群众的绿色环境需求与国家层面的能源安全要求,共同推动绿色转型从成本约束全面转向增长引擎,并催生出兼具巨大社会价值与长期资本回报的新投资赛道。绿色新增长点的核心在于对传统能源系统和生产模式的系统

性替代与升级。其中,新型储能是解决新能源消纳难题、保障电网安全的关键环节。据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项目累计装机规模达7376万千瓦/1.68亿千瓦时,装机规模占全球总装机规模40%以上,中国新型储能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循环经济从“废弃物经济”升级为“资源替代经济”,构建了全新的价值链。以动力电池回收为例,2024年国内动力电池回收量突破30万吨,对应市场规模超480亿元,预计到2030年回收市场规模将突破千亿元。节能改造、氢能和核聚变等赛道也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些投资不仅服务于“双碳”目标,更通过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形成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绿色内需市场和内生增长动力。

结构变迁开辟的新市场空间

“十五五”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产业升级需求的结构性转换升级,正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开辟出广阔的新市场空间。

一是“银发经济”的全面崛起。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在2025至2030年期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快速增长至3.9亿,催生一个规模达十万亿级的消费市场。银发经济的增长点正从基础的养老服务,向老年旅游、在线教育、康复辅具、智能陪护机器人等高品质、个性化领域扩展,其服务模式与技术应用可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行经验,并基于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实现迭代创新。

二是县域经济是稳消费的重要基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包括镇区和乡村的县乡市场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超过38%,县域正成为新能源汽车、品牌家电、体验式零售等领域的增长新空间。当县域居民能在家门口获得优质的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其消费潜能才会被真正、可持续地激发,这本身也是最大的民生。

三是城市更新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协同推进扩大内需增量。城市更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高质量的承载空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城市更新带来活力与需求。通过对存量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的综合整治,直接撬动绿色建筑、智能家居、社区养老、地下管廊等领域的投资与消费。通过深化户籍、社保、土地等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推动其消费模

式从“基础型”向“发展型”跃升,在住房、教育、文化等方面产生持续的消费需求。

四是“卡脖子”技术国产替代带来的战略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西方国家在高端芯片制造设备、EDA软件等领域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使得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从“备选项”转变为“必选项”。随着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逐步取得突破,国产替代能力的不断提升,将催生出新经济的增长点,为内需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动态时序塑造的新增长循环

不断形成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是一个响应人民需求层次递进、持续升级的动态过程。“十五五”规划的五年周期,是一个要求兼顾短期成效与长期动能的完整时序单元。一方面,用好短期政策回应社会最急切的民生需求,为长期发展筑牢根基。通过适度的消费激励等逆周期措施兜牢民生底线、稳定社会预期,既可以预防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也为推进科技攻关、收入分配改革等利在长远的举措创造稳定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长期战略实施及政策推进可以持续创造新的需求。例如,对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投资,既是构筑长远竞争力的战略决策,也能在当下立即形成有效投资与就业。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可以激发显著的财富效应,提升居民消费信心。因此,短期政策要解民生之“近渴”,长期政策则需布局发展之“远局”,并在实施过程中让人民群众尽早感受到“远局”带来的“近利”,由此构建起内需新增长点“不断形成”的良性循环。

内需新增长点的形成,是人民需求牵引与市场创新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民对美好生活持续升级的向往,构成内需扩张的价值牵引力。创新赋能驱动的新消费生态、绿色转型催生的新投资赛道、结构变迁开辟的新市场空间,勾勒出“十五五”时期内需持续增长清晰的图谱。我们必须抓住扩大内需新增长点的核心特征,以制度创新驱动激活市场力量,以时序智慧平衡短期与长期,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不断开辟内需新空间,培育增长新动能,筑就国内大循环的动力之基。

(据《光明日报》作者系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杨美

城市更新将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抓手,城市更新将实现城市空间再造,城市功能重塑、生活品质跃升、文化记忆延续和发展动能转换,全面塑造城市竞争新优势。城市更新模式也将由政府或开发商主导向政府引导、居民主体、市场参与转变,由零散化、碎片式的更新向规划引领下的区域统筹更新转变,而利益协调、共识达成、资金筹措与监管、多部门协同、建运营一体化保障机制等成为自主更新最大难题,这对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发挥街道社区协调利益、统筹资源、提升物业服务品质、构建长效运维保障机制、凝聚多元主体共治力量提出迫切要求。

从社会治理重心变化看,更加重视功能整合、资源下沉、落地见效。2023年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组建标志着社会工作体制机制的系统性调整,折射出党中央强化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更加注重整体性、系统性治理的逻辑转向,目的是通过职责集中、机构整合、统筹联动解决社会工作零散化、碎片化、低效化的问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持续强调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具有去单位化、灵活性高、流动性高的特征,与传统党组织管理高度组织化的模式不相适应,这就对“十五五”时期如何进一步与时代俱进创新工作方法,务实解决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构建覆盖广泛、务实管用、既有管理也有服务的党建新模式提出更高要求。

从社会治理手段融合看,更加重视数智赋能、人文关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公共服务效率提升,应用场景拓展,风险感知提前和应急决策优化,与此同时也伴现出了效率与公平、隐私与伦理、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冲突。“十五五”时期从技术治理转向智慧治理,不仅仅要把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集成嵌入到更多应用场景中,更对政府创新管理理念与模式、打破数据壁垒和部门区隔,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数字治理模式提出新要求。

主动把握“十五五”时期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推进减负、赋权、增能落地见效。党建引领是破解社会治理碎片化、资源配置失衡、人心力量分散、治理合力不足的关键,也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保证。党建引领以发挥引领作用,关键是要发挥好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针对基层治理中存在的力量薄弱、资源短缺的情况,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区域统筹、多方联动,将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共建单位、驻区单位、志愿服务等直接资源链接起来,统筹起来,以强大的组织凝聚力实现基层党建联抓、志愿服务联动、区域治理联享,突出问题联治。针对基层治理存在的“小马拉大车”权责不对等的基层治理顽疾,多管齐下,下大力气解决面向基层的督查、检查、考核过频过滥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任务清单制,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加强基层服务管理力量配置,完善服务设施和经费保障机制。持续推动基层减负、赋权、增能等长效机制落地见效,真正让基层政权有精力、有资源,专注于服务群众、造福群众。

利用城市更新,推动需求满足、环境改善、管理提质。城市更新对优环境、稳增长、扩内需、促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多重积极作用,更对盘活存量资源、创新优化配置宜老宜小公共服务设施提出迫切要求。要主动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发展趋势,在完善社区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工作中改变传统分割、划界、碎片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创新探索和建设“老幼共生”社区,整合衔接好各类惠民政策,一体建设利用好养老托育、儿童托管、社区助餐、家政便民、康养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等一站式服务设施,构建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结构与功能合理配置的社区嵌入式综合服务体系。要坚持体检先行和协商共治,涉及电梯加装、资金筹集、产权认定、拆迁补偿等可能遇到的利益冲突、矛盾分歧,街道社区要发挥好沟通协调和矛盾化解桥梁纽带作用,构建“体检先行一诉求收集一多主体参与一协商共治”的常态化议事机制。坚持设施更新与治理升级同步跃升,按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加强社区居委会对物业、业委会的监督,倒逼物业提升服务质量,着力构建业主自治、物业履职、居委会协调的良性共治关系。

用好数智技术,兼顾效率提升与人文关怀。数智化既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有效路径和重要目标,也对创新治理理念、重塑治理流程、兼顾安全与伦理、效率与公平提出更高要求。推动数字治理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将技术效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解放思想、摆脱路径依赖。要以创新思维、有解思维、系统思维为引领,数据向善为导向,数字技术为支撑,数据共享的同时,利用新技术解决老问题。数智赋能的同时还要倡导科技向善理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根本原因就在于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数字技术只是治理工具之一。在技术全面扩张的同时还应强化技术与人文的协同互补,注重保持对人的尊重和关爱,重视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防止滋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防止数字“赋能”变成数字“负能”、指尖“便利”沦为指尖“负担”。

与时俱进抓好新兴领域党建、寓管理于服务为一体。新业态形态劳动者体量大、分量重,成为职工队伍重要组成部分。与时俱进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成为“十五五”时期社会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明晰责任分工,通过构建党委负总责、社会工作部门牵头抓总、行业部门和监管部门共同参与、街道乡镇党组织兜底管理的党建工作格局,确保新兴党建工作始终有人问、有人管、有人抓。要抓住关键切入点,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放在突出位置,着力完善新业态劳动者普遍关心的劳务纠纷调解、劳动报酬、休息安全、技能提升、平台企业用工责任等权益保障制度建设问题,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在优化服务保障中提升对党组织的政治认同、情感归属。要创新方法,依据新就业群体现实需要持续开展友好商圈、友好社区、友好街区等多元友好场所建设。通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超市等城市小微空间建立末端服务站、在重点区域建立集成式、一站式枢纽型服务站等方式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实际问题,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爱新业态劳动者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中共呼和浩特市党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在“十五五”规划建设中,环境治理政策实践被置于重要战略地位,规划治理明确提出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通过系统治理与结构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呼和浩特在“十四五”期间,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治理政策发挥了显著成效,“十五五”时期,继续从目标延续、政策深化、机制创新三个维度努力,为北方城市生态治理提供“青城答卷”。

“十四五”期间环境治理政策实践:成效与经验

“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系统推进环境治理政策实践,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呼和浩特经验。这些经验为呼和浩特可持续发展筑牢了根基,更为全国城市提供了生态治理的鲜活样本,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稳步前行。

在污染防治方面,呼和浩特以“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为抓手,精准治污。在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呼和浩特采取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燃煤锅炉综合整治、煤改气、煤改电等工程推动清洁能源供暖全覆盖,空气质量优良率明显提升,大气环境得以改善。水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呼和浩特启动班定营污水处理厂三期扩建,强化城区管网建设,实现雨污分流全覆盖,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积极推进土默川平原盐碱地改良,实施“无废城市”建设,建成多个“无废细胞”示范单元,土壤污染防治取得重大成效。在统筹污染防治中,有关部门充分运用系统思维,精准施策推动环境改善,构建起多维立体的环境治理政策体系,为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生态根基。

在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方面,呼和浩特将生态修复与绿色转型政策协同推进。在重大生态工程修复建设方面,构建“青山—黄河”生态廊道,实施大青山前坡绿化巩固、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工程,实现森林覆盖率与草原植被盖度双提高。在绿色转型方面,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建成多家绿色工厂,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新能源领域,城区实现全面清洁供暖,风光氢储装备制造产业链基本形成,新能源的应用率不断提升。呼和浩特通过生态修复政策筑牢绿色根基,以产业转型政策激活发展动能,以清洁能源政策引领未来方向,为推动生态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政策机制方面,呼和浩特不断加强政策创新与机制保障,建立五域协同治理体系,创新制度框架,形成专班统筹、季度调度、绩效评估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在跨区域协作方面,牵头建立呼包鄂乌跨界河湖共治机制,实施“双河长制”,联合开展黄河四乱整治。同时,率先推进可再生能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展碳汇经济。呼和浩特积极创新政策机制,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与跨域协作模式,开拓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新路径,激活绿色发展新动能,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可行路径。

“十五五”时期环境治理聚力赋能:展望与担当

“十四五”期间,呼和浩特环境治理政策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绿色转型等多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为“十五五”时期环境治理政策走深走实奠定了坚实基础。“十五五”时期,呼和浩特环境治理政策走深走实需要从目标延续、政策深化、机制创新三个维度推进环境治理系统化转型,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延续生态环境治理目标,从阶段攻坚转化为长效治理机制。目标延续是在时间推移中保持战略方向稳定,结合环境变化动态调整实施路径,确保长期目标不被短期波动中断,实现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平衡,保障组织或政策价值持续创造。“十五五”时期需以动态目标管理为核心,构建“短期攻坚—中期巩固—长期优化”的递进式目标体系,通过建立环境目标动态评估机制,基于监测数据、政策成效及公众诉求修订治理指标,将长期目标分解为年度任务,通过目标考核的闭环链条确保政策落地。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延续既能巩固“十四五”环保政策的阶段性成果,又能通过动态机制适应新挑战,实现环境治理政策的长期稳定与持续优化。

政策深化从专项治理向全域统筹转变,全面深入推进呼和浩特治理效能提升。政策深化是对既有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改进与革新,旨在突破政策执行的表层治理,通过系统性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推动政策目标向更高阶段、更深层次发展。“十五五”时期需推动政策系统化转型,实现环境治理从局部到整体的跨越。如在环境治理过程中,打破部门行政壁垒,构建覆盖大气、水、土壤、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综合性政策框架,强化跨领域政策联动,实现政策深度耦合。在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上,呼和浩特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建设“千万千瓦级风光新能源消纳基地、抽水蓄能和燃机调峰电源基地、多式新型储能基地”,不断将政策目标向更深层次调整。在政策制定的基础上,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与协同规则。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深化将推动呼和浩特环境治理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化,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深度耦合。

创新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生态构建机制,推动形成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机制创新通过引入新的理念、方法、技术或制度安排,对现有组织、系统或流程中的运行规则、互动方式和动力结构进行系统性变革与优化,以提升效率、激发活力,适应环境变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十五五”时期需进一步推动治理效能全面提升,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协同机制。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明确不同角色的定位与互动规则。政府加快角色转型,通过立法、规划、监管等手段提供制度保障。市场层面激活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金融等工具,让企业通过参与环境治理获得经济收益。社会参与方面,建立环保公众参与、监督平台,将生态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社区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与环境治理的浓厚氛围。创新多元共治机制不但能激活呼和浩特生态治理活力,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更能推动形成全民参与、持续发展的绿色治理新格局。

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呼和浩特需以“双碳”目标为战略牵引,构建“目标—政策—机制”三维联动体系,不断优化环境治理政策,推动环境治理问题实现从单点突破到系统转型跨越,促进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深度融合,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呼和浩特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呼和浩特市党委)

呼和浩特“十四五”期间环境治理政策实践与“十五五”时期发展展望

●李静怡